

王琳○著

文物考古  
与古玩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

王琳○著

文物考古  
与古玩史研究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考古与古玩史研究 / 王琳著. —哈尔滨: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207 - 09628 - 9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物—考古—研究—中  
国②古玩—历史—研究—河南省 IV. ①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4427 号

---

责任编辑: 孙国志

装帧设计: 张 慰

---

## 文物考古与古玩史研究

王 琳 著

---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5 插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628 - 9

定 价 25.00 元

---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dbw.cn](http://www.dbw.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 序

王琳，河南大学历史系首届文博专业毕业。在校学习期间亦很努力，尤其注意文物考古的研究，曾在《大学生史林》上发表文章。1992年在张文彬、王传真、孙传贤等河南省文物界老前辈的关心下进入开封市文物商店工作。在文物商店工作期间，她虚心向云学文等学有专长的开封文物鉴定前辈学习请教，还拜翟渊民先生为师学习过文物修复技术，她还曾为河南大学文物馆修复过镇馆之宝——唐代三彩鸳鸯。（此三彩鸳鸯是经宋史专家周宝珠先生文革期间在巩义为历史系文物陈列室收购所得，被定为一级文物）在组织的推荐下，她先后两次到国家文物局扬州文物培训中心参加玉器鉴定班培训和河南省首届陶瓷鉴定班学习，特别是在扬州文物培训中心，她的玉器鉴定受到了原上海雪耕斋古玩店后人，著名文物鉴定家张永昌先生的指点。在努力提高实际文物鉴定水平的同时，她还注重对文物考古理论的学习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其间我们合作撰写发表过几篇论文，这些论文都因她的谦虚而将我的名字署在前面。后来，隆文到西安求学，她就承担了对两个家庭的责任，应对家中琐事、照顾老人起居少有怨恚，这是我们心中颇感安慰的！

先外舅早年于辅仁大学外文系毕业，一生醉心于祖国的金石书画，王琳书中所谓群古斋与河南古玩业史兴衰的故事，皆有所本。据报道今日文物界著名的国之大器——四羊方尊，就是由群

古斋的已故学徒张欣如先生修复的。群古斋在近代古玩行业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群古斋古玩经营之兴衰既是河南商业史的一部分，也是一段“家事”。现由后辈人重新整理出版，也算是酬了我们老一辈人多年的宿愿。我为她(他)们学术上又有新的进步而由衷的高兴！故乐为之序。

八十拙叟 陈昌远于大梁城  
二〇一三年元月二十八日

# 目 录

<b>第一章 玉器与陶文研究</b>	.....	(1)
一、浅谈玉带钩	.....	(1)
二、说“琮”	.....	(5)
(一) 玉琮的出土与分布	.....	(5)
(二) 玉琮起源	.....	(8)
(三) 玉琮用途发微	.....	(12)
(四) 从良渚文化的玉琮看古代华夏文明的起源途径	.....	(17)
三、从郑韩故城出土陶文看先秦乡遂制度	.....	(21)
四、对河姆渡五叶纹陶块的思考	.....	(28)
<b>第二章 青铜器与古代货币研究</b>	.....	(33)
一、匍鴟铜盃应为匍雁铜盃新释	.....	(33)
(一) 铭文释读	.....	(33)
(二) 器形命名与匍大夫的身份	.....	(36)
(三) 应、邢关系与古代颠聘之礼	.....	(38)
二、从杨姞壶谈古杨国问题	.....	(41)
(一) 关于“杨姞壶”是“媵器”还是自作器问题	.....	(41)
(二) 关于姬姓杨国受封的时间问题	.....	(42)
(三) 关于古杨国的地望问题	.....	(45)
三、《沈子也簋》与沈国地望问题	.....	(47)
四、试谈钱的用途——驳“生产工具”论	.....	(53)

五、有关《三年大将吏弩机考》的濮丘问题	(59)
六、战国荣地韩币四考	(63)
(一)宅阳布	(64)
(二)郟布	(65)
(三)四阳布	(65)
(四)垂字布	(67)
七、战国魏大梁布币的释读问题	(67)
八、《保卣》铭诸释评议	(71)
(一)“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	(72)
(二)“征(诞)兄六品”	(75)
(三)“蔑历于保与易宾”	(77)
(四)“文父癸宗宝尊彝，遘于四方会大祀祔(祐)于周，在二月既望”	(78)
(五)铭文中“保”的问题	(80)
(六)作器者“保”的身份问题	(85)
第三章 古都与古国研究	(87)
一、有蟜氏故里考	(87)
(一)不能轻易否定古文献记载	(87)
(二)有蟜氏故里在何处?	(89)
(三)是否有旁证?	(92)
二、禹都阳城与天下第一都	(94)
三、古赖国地望考辨	(100)
(一)有关赖国地望的两种不同意见	(100)
(二)“厉”与“赖”应为二国二姓	(101)
(三)古赖国地望应在河南息县包信镇	(102)
四、中国早期王都的基本特征	(105)

<b>第四章 古代墓葬碑刻与相关问题研究</b>	(117)
一、也说楚墓出土的鸟架鼓镇墓兽及其他	(117)
二、有关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几个问题	(121)
(一)关于汉代理葬习俗	(121)
(二)关于墓主人及墓葬的断代	(122)
(三)关于出土遗物所反映汉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	(126)
三、从碑刻看清代北舞渡镇的金融业	(128)
<b>第五章 群古斋与河南近代古玩史研究</b>	(137)
引言	(137)
一、群古斋与河南近代古玩业的兴起	(140)
(一)二十世纪初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40)
(二)二十世纪初河南丰富的文物资源	(143)
(三)近代河南省会开封商圈中的群古斋	(145)
二、从群古斋看河南近代古玩业	(149)
(一)经营品种	(149)
(二)经营方略	(152)
(三)人员构成组织与管理	(156)
(四)分配与福利	(160)
(五)社会慈善与救济	(161)
(六)同业内外的交往	(163)
三、抗日战争爆发与群古斋及河南古玩业的衰落	(169)
(一)爆发前河南金融业的动荡	(169)
(二)国难中的艰辛	(171)
结语	(173)
后记	(175)

# 第一章 玉器与陶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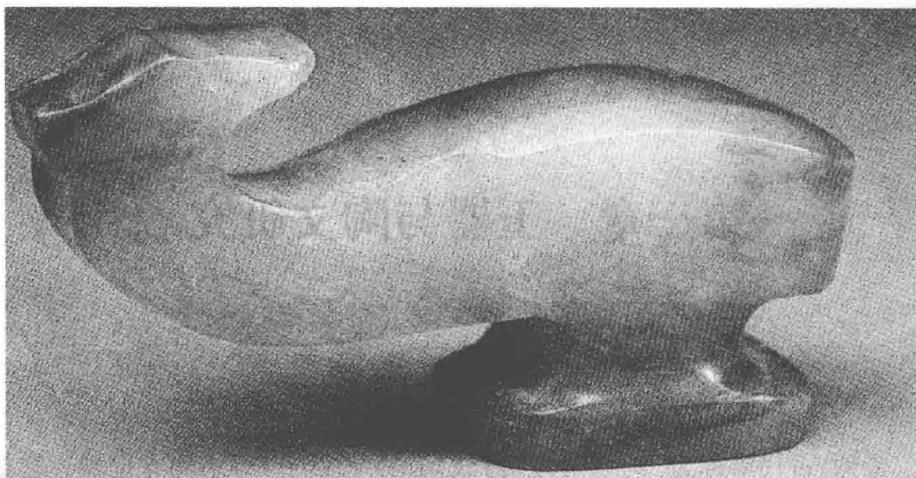
## 一、浅谈玉带钩

带钩，古代单称为“钩”。《左传》、《国语》、《管子》等书均有记载。它是古人用来钩系束腰的腰带头，是一种钩、钮合体的器物。一般都与革带配合使用，所以又称“带钩”。带钩之全称，在古籍中仅见于《史记·齐太公世家》，云：“……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带钩之名，即源于此。

带钩的造型比较简单，分钩首、钩体和钩钮三部分，较常见的形状是：钩头位于钩体的一端并向上弯曲成钩状；钩体正面为钩面，常饰以各种纹饰，钩体反面为钩背，钩钮设在钩背近尾处或中部，与钩体相连。此带钩在古代既可束腰，有时也可用来系挂一些常用物品或装饰性物品。它既是一种实用品，又是一种装饰品，因此使用十分广泛。仅就目前遗存下来的带钩看，其质地繁多，有金、银、铜、铁、玉、琉璃等，造型各异，大小不一，制作一般均很考究，尤其是玉带钩，更是精雕细琢，美不胜收。

关于玉带钩制作的上限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以前，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春秋中晚期出现的，到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才由北方传入中原。到八十年代初，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中发现1件带钩形饰，另在余杭反山发现3件，瑶山发现1件，它们均出土于死者腰部，器呈扁长方体，素面，一端有孔，另一端挖琢成弯钩状，可作钩挂之用，专家们推断其为玉带钩，故此将玉带钩出土的上限提早到良渚文化。但其造型简单，与春秋以后出土的玉带钩有明显不同，而商周遗址或墓葬中又无玉带钩出土的证据，商周玉带钩的形制究竟如何也不得而知，因此从良渚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玉带钩的形制的继承、演变关系，还待考古发现和专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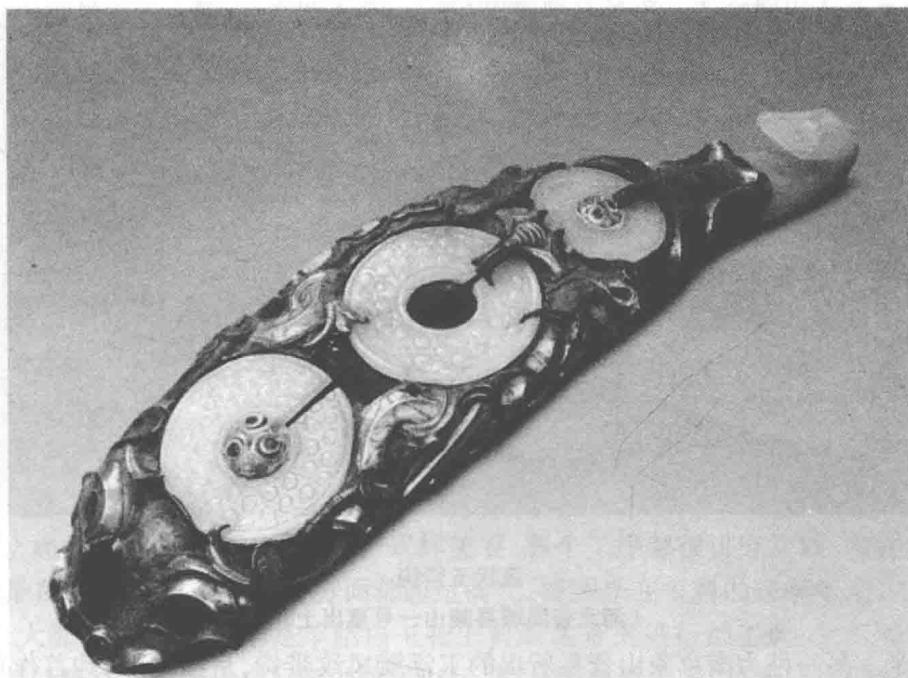
至春秋战国之交，考古发掘多有玉带钩出土，如陕西凤翔高庄秦墓，河南固始勾敔夫人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和山东曲阜鲁故城等，从众多的资料可以看出，此时玉带钩无论大小，制作均很精美，且多为长条形或琵琶形，一



(战国玉带钩,传世品,现藏苏州文物商店)

一般来说钩首多为龙头或兽头,且微微昂起,嘴扁薄,无斜度;钩面光素或用阴线勾勒纹饰;钩钮有方、圆两种,多设在近尾端,且钩钮多与钩身相平。此外,此时玉带钩的制作方法基本相同,并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带钩钩面两侧边沿,都削成微小的斜坡度,顺着龙首弯势而下的颈背两侧边沿也切削成微小斜坡度,且斜坡度非常平整。现举例加以说明,1994年11月份在扬州古玉器学习班,我亲见一战国玉带钩,属传世品,现藏苏州文物商店。(如图所示)该带钩从其质地来看,为白玉,通体泛黄,且有黑褐色的膏药沁;从整体造型和纹饰布局来看,长条形,钩首为龙首,龙头微微昂起,嘴扁薄,杏核眼,眼梢稍长;钩面纹饰布局分三区,四周用阴刻线勾勒方框,内饰“S”形纹、小圆圈纹、勾云纹、朵云纹,而“S”形纹和小圆圈纹又形成一个个龙头形的图案;钩身两侧也各有两个大“S”纹;钩身及颈背两侧均推磨成微微斜坡度,极为整齐;钩钮为方钮,设在尾端且与钩身相平;再从雕琢技法上来看:钩身两侧的大“S”纹是先用双勾线勾,再分别从两头打洼,其坡度相反,然后在中间会齐,形成立体的“S”纹;其次龙头的面部及眼眶均采用深挖技法,突出面部肌肉和眼珠,而龙嘴周围又采用打磨技法,突出嘴部形象,使整个龙首看起来立体感很强,极具真实感。总之,此件玉带钩无论从造型、纹饰布局还是雕琢技法,都具有战国玉带钩的明显特征,是战国玉器中的一件精品。不过在战国玉带钩中,最精美的应属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墓所出土的1件琵琶形包金镶玉带钩,其钩首以白玉琢成鸭头,钩面为包金组成的蟠龙,嵌白玉璧和料珠,十分罕见,故推为战国时的极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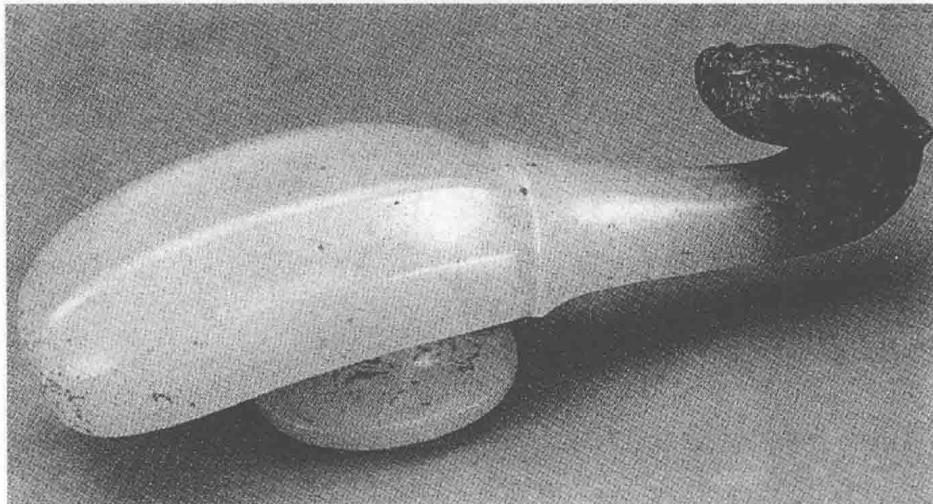
秦汉时期,玉带钩的制作基本继承和发展了战国的技法和形制,只是使



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墓出土战国玉带钩

用上更加普遍化了。此时玉带钩其用途虽无两样,但形制却无雷同,正如汉人刘安在《淮南子》一书中所说:“满堂之作,视钩各异……”具体说,此时玉带钩数量较多,无论大小,一般选料均很讲究,多用优质的新疆和阗玉;其形制虽各取巧作,但其钩首多作兽头形,鼓背,圆形钮,钩身较战国为短;有素面也有饰纹的,纹饰以云纹为普遍,且无论其大小、形制如何,均琢磨得洁净光滑、棱角分明,看起来非常挺拔、利落。这在汉代考古发掘资料,如河北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河北定县中山简王刘焉墓所出土的玉带钩中均可找到明证。如图所示三个玉带钩为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一号墓出土,皆为白玉琢成,左:长6厘米,玉质温润有光泽,通体光洁晶莹,细致规整,背部鼓起,阴刻卷云纹,腹部有一椭圆形钮;中:长4.2厘米,钩体较短,背部饰兽面纹,腹部有一圆钮。右:长5.8厘米,钩首作兽头形,背部浮雕一兽,两侧阴刻卷云纹,表面有朱红痕迹,腹部有一圆钮。此三件玉带钩抛光极好,玻璃光很强,且均为汉代典型玉带钩之造型,可作为汉代玉带钩断代的标准器物去参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带钩出土明显减少,至今为止仅见二件。一件为湖北汉阳蔡甸一号墓所出土的玉带钩,造型为龙首曲径圆腹状,钩体肥短,长5



汉代玉带钩  
(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一号墓出土)

厘米。另一件为南京象山晋墓所出的玉浮雕凤纹带钩，呈琵琶形，钩首作鸟首，钩面浮雕一凤，钩背近尾端处琢一圆钮，与汉代大致相近，但钩头很小，式样非常美观。从出土情况看，此时玉带钩处于衰落阶段，据专家推测，这可能与玉带扣的普遍使用及服饰的变化有关，因而玉带钩的实用意义已减退。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唐墓中至今为止仍不见有玉带钩出土。宋代玉带钩仅在江西吉永县南宋嘉熙元年墓中发现一件，长12厘米，呈琵琶形，钩体光素，钩头作龙首状，刻划比较具体细致。由于资料有限，唐宋玉带钩究竟有何特征，目前尚缺乏清楚的认识，还有待以后考古发掘和进一步的研究。

元明清时期，玉带钩的制作开始回升，这从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品中均可得到证实。在元代墓葬中时有带钩出土，像江苏省无锡市钱裕墓出土有白玉带钩，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也出土一件玉带钩；而且传世品中元代的玉带钩也不在少数，经专家研究认为元代带钩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造型有两式：(1)琵琶式；(2)阔板式。琵琶式元代以后较为少见。其整体造型粗犷豪放，刀法重而锋利，给人以不拘小节大刀阔斧之感。(二)带钩的钩首多为龙首，龙头较长，头面较平整，龙颈从侧面看较宽阔；一般情况下，龙多呈闭口状，有的口微张，并在口沿处雕刻着一排龙牙(有的只起一道阴刻线而不刻牙齿)。(三)带钩钩面上多雕蟠螭纹，且蟠螭距离龙头较远，螭大多紧贴在钩面上，后腿一前一后，状若爬行。(四)此时玉带钩琢磨的大多精

细,但抛光工序一般,光亮度不高。(五)玛瑙制品较多。若掌握以上几个特征,仔细分辨,基本可以辨出元代玉带钩。

明清时期,玉带钩已不是先前的实用品,而是成为上层统治者及爱好古玩的雅士们发怀古之幽思的鉴赏品。因此在此期间玉带钩的制作选料更为严格,琢磨的也更为光润细腻,造型多为长条形,明代和清朝前期带钩的共同点是:龙头稍短,头面额际稍呈隆起状;龙颈从侧面看比元代稍窄;口微张,但较元代开缝略大,口部从侧面看,略有斜度(清代中晚期斜度更加明显),鼻梁凹进,眼睛突出,呈虾米眼型。钩面上雕蟠螭,螭身腾空,螭身与钩面的联结处镂空,形成透空现象,龙嘴与螭的距离略近,大约仅容一支普通笔的距离(元代则容一支笔绰绰有余)。而明代与清代早期也有不同点:即明代玉色大多不佳,多夹糖色或是青中带黄,且琢磨工艺水平也较差,底面上往往出现小波浪纹痕迹,虽然光泽度很高,但终掩盖不住琢磨粗糙的缺陷。而清代早期带钩,玉色洁白,式样美观,各个工序都很讲究实效,因此无论是在制作、磨工及抛光等方面都超过前代,特别是在玉料的选择上非常严格,大都采用白玉,特别是羊脂白玉和上等粉皮青玉进行加工的,故所制带钩特别精细。到清代中后期即乾隆以后,因其销售量大减,故专门经营此物的作坊改制其他应市玉品,玉带钩的琢工也从此粗劣,龙头面额隆起更为显著,鼻梁凹度更为严重,龙眼为典型的虾米眼,“像两根小棍一样突出”,钩面上的螭身更加腾空,且距龙头更近,螭的形象已显笨拙,似停留状态,其生动活泼的气息一点也没有了。此时的玉带钩仅成为玉市中附设的点缀商品。民国时期,玉带钩多仿古充旧,造型也很奇异,但已没有多少艺术欣赏价值了。

总之,玉带钩的产生和发展演变,既有其时代特征,也有其本身的艺术特征。因此,在鉴别和研究时,若详加分析,就能掌握其基本规律,可以进行断代研究。

## 二、说“琮”

### (一) 玉琮的出土与分布

琮,在上世纪30年代施昕更先生发掘良渚文化遗址之前就有出土,但大

都流传海外。自从 1972 年江苏吴县草鞋山发掘之后<sup>①</sup>，江苏吴县张陵山<sup>②</sup>、常州寺墩<sup>③</sup>、上海青浦福泉山<sup>④</sup>、上海市松江广富林<sup>⑤</sup>、上海马桥<sup>⑥</sup>，以及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处，<sup>⑦</sup>江苏海安县青墩、江宁县处庙、武进县的横林青墩、雪堰桥南山和湖塘金鸡墩、吴江梅堰龙南遗址、常熟市的三条桥、黄土山和嘉菱荡、昆山的绰墩、新沂县的花厅、阜宁县陆庄、涟水县三里墩以及吴县的东渚等地均发现有琮。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玉琮的地点已超过 20 余处。<sup>⑧</sup>

在黄河流域和珠江流域也都曾发现与良渚文化完全相同的玉琮遗物。<sup>⑨</sup>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一件玉琮，四角施简化的兽面纹，上端正中刻有大汶口文化陶缸上所见到的<sup>○</sup>形纹饰。<sup>⑩</sup>在山西襄汾陶寺类型墓葬中也发现有玉琮。<sup>⑪</sup>陕西华县梓里、甘肃永靖秦魏家以及广东曲江石峡文化晚期也有玉琮出土，并伴出有玉璧。<sup>⑫</sup>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河流域二里头文化晚期曾有玉琮出土，可惜残损，难以窥其全貌。<sup>⑬</sup>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琮达 14 件之多，其中报告称之为琮的 11 件。<sup>⑭</sup>但在大司空村的 166 座殷墓中，仅出土 1 件琮。<sup>⑮</sup>在陕西延安 1981 年曾征集到一批玉器，除玉琮外，还有玉璧，有人认为这批玉器是西周遗物，但不一定是同时制作的。<sup>⑯</sup>玉琮在西周以后发现较

①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80 年。

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文物出版社，1983 年。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第 2 期。《1982 年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 年第 2 期。《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86 年第 10 期。

④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 年第 2 期。

⑤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考古》1962 年第 9 期。

⑥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 期。

⑧ 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文物》1984 年第 2 期。

⑨ 南京博物院：《1987 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 年第 2 期。

⑩ 石志廉：《最大最古的<sup>○</sup>纹碧玉琮》，《中国文物报》1987 年 10 月 1 日。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1 期。《1978 年—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⑫ 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石峡发掘小组：《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7 期。

⑬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 年第 5 期。

⑭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

⑮ 马得志等：《1953 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

⑯ 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文物》1984 年第 2 期。

少。如殉葬玉石器较丰富的上村岭虢国墓、固围村一号墓的埋玉坑,出土玉礼器及玉饰甚多,但无琮,其他仅在沣西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中出一残片,<sup>①</sup>洛阳中州路东周墓中仅出土一石琮,<sup>②</sup>辉县褚邱战国墓中出土一玉琮。<sup>③</sup>

从上述考古材料可知,玉琮的大量出现是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分布地域以长江中下游最为集中,黄河流域则相对较少。有的先生认为“璧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sup>④</sup>。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玉琮,与它所处的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根据古文献记载,苏、浙、皖三省是古玉的重要产地。

《清一统志》曰:“江宁县东十五里琛山昔尝出玉”。

《古矿录》曰:“昇州(今南京)土产茅山石光白如玉”。“梁园砀山(今安徽砀山县南)出文石(即玛瑙石)”。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砀文石也,其山出焉,故以名县”。

《九域志》曰:“苏州土贡白石脂十斤”。

《古矿录》曰:“苏州土产白石脂(即所谓高岭土)太湖石”。

《清一统志》曰:“苏州吴县鼋头山,在县西南,亦洞庭支岭也……山产青石,有天然玲珑者,谓之花石,宋徽宗时采贡,故有花石纲。又一种白色而温润,堪为玩具,号为玉石”。

《长州县志》(今吴县):“阳山在县西北,一名秦余杭山,《越绝书》秦余杭山越王棲吴王夫差山也,有白如玉号曰石脂”。

《古矿录》曰:“灵璧县(安徽省)菜玉山在县在西南三十里产石类菜玉”。

《明一统志》:“荆山在怀远县(今安徽)治西南,城经其上,山之西北有玉坑,乃卞和采玉之所,白石异常,其他处石皆青黑”。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玉石的产地中心是在江苏太湖地区。南京地质研究所的专家认为草鞋山、张陵山所出玉器,其玉料很可能采自太湖周围的富溧山地、天目山脉和宁镇山脉。这一地区虽然至今未发现玉石矿藏,但曾钻探到个别标本。<sup>⑤</sup>根据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物来鉴定,应为阳起石。有关地质资料表明,在太湖附近的丘陵地,蕴藏着上述玉石材料<sup>⑥</sup>,完全是可靠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

<sup>②</sup>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

<sup>③</sup>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sup>④</sup> 《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

<sup>⑤</sup> 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文物》1984年第2期。

<sup>⑥</sup>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的。因此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玉琮不是偶然的。

## (二) 玉琮起源

玉琮的起源，是近年来考古学界研究争论较多的问题，今概括有以下诸说：

1. 琮乃“织机上提综开交之物。本是木制，传世玉制品之长大者，是汉人之仿制”<sup>①</sup>。
2. 琮为中雷之象征。吉斯拉以为琮为家屋“中雷”即烟筒的象征，为家庭中祭拜的对象。<sup>②</sup>
3. 玉琮源于土地经界和定居的意识。<sup>③</sup>
4. 琮系日常生活用具“方嘞”的模仿和扩大。<sup>④</sup>
5. 玉琮源于玉镯。<sup>⑤</sup>
6. 琮似女阴性器。<sup>⑥</sup>

以上诸说，均找不到古文献的根据。仅从器形发展本身看，源于玉镯之说比较恰当。早年日本人林巳奈夫先生认为琮的来源可能是一种妇女的手镯，以后逐渐演变成为礼器。冯汉骥先生也说：“考虑到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遗物中，均有一种圆筒形的手镯，其质料有玉、石、陶、骨、象牙等，这类手镯以后由饰物发展成为礼器，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因此，我们认为这一假设可能是比较合理的。”<sup>⑦</sup>这种说法也仅仅是对玉琮从形式上进行探索，而没有对玉琮的起源进行论证，因而是很不够的。既然玉琮“很可能源于圆筒式玉镯”<sup>⑧</sup>，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先民大量地雕琢造型奇特、纹饰繁杂的玉琮呢？这个问题，在持如是观点的文章中并没有很好地给以回答。

最近有人将𠂇释为琮字，<sup>⑨</sup>那么甲骨文中“禹𠂇”当是一种仪式，即举琮

① 郭宝钧：《古玉新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20卷，1949年。

② 滨田耕作著，胡肇椿译：《古玉概论》，中国书店，1992年。

③ 诸汉文：《良渚文化玉琮试析》，《文博通讯》1983年第5期。

④ 杨建芳：《中国史前五种玉器及其相关问题》，《新亚学术集刊》。

⑤ 林巳奈夫：《中国古代的祭玉瑞玉》，《东方学报》第40册。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文物》1979年第2期。

⑥ 凌纯声：《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九期。

⑦ 冯汉骥：《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⑧ 邓淑苹：《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古玉鉴赏集》（下），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编，1992年。

⑨ 沈之瑜：《释𠂇》，《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年。

以行祭祭，因此有人认为琮当起源于祭祀。<sup>①</sup>

为了说明玉琮的起源，首先应该探索琮字本身的意义。对于琮的解释，唯一能找到的根据就是《周礼·春官》：“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又《周礼·玉人》曰：“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大宗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为内镇，宗后守之”。“瑑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

对琮字含义的解释，还是以《周礼》郑玄注为最好：“琮之言宗也，八方所宗故。外八方象地之形，中虚圆，以应无穷，象地之德，故以祭地”。故《周礼·春官》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为什么古人要以六器礼天地？《尚书·大传》说得很清楚：“万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载，非春不动，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所以《周礼正义》曰：“唐、虞有六宗之祭，六宗者，天地四方之神”，故《周礼·春官》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就是六瑞，也是对“琮”字含义的最好解释。可是在这里《周礼》解释以“黄琮礼地”之说，有人认为不可靠，否认《周礼》解释的正确性。夏鼐先生认为：“《周礼》是战国晚期的一部托古著作，我认为这书中关于六瑞各种玉器的定名用途，是编纂者将先秦古籍记载和口头流传的玉器名称和它们的用途收集在一起；再在有些器名前加上形容词使之成为专名；然后把它们分配到礼仪中的各种用途去。这些用途有的可能有根据，有的是依据字义和儒家思想，硬派用途。这样他们把器名和用途增减排比，使之系统化了。”<sup>②</sup>这个看法是对先秦文献没有给以正确的评价的结果。应该看到，《周礼》这部书虽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是它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各种礼仪制度，最后把它用文字形式固定记载下来。而以后汉人的各种解释，也都根据当时流传下来的东西，加以系统整理而成。所以《周礼》一书所记应该说是可靠的。<sup>③</sup>

琮，古为六瑞之一。“以玉作器以礼天地四方”<sup>④</sup>，这个制度应源于远古。在六种瑞玉中，以璧、琮最为重要，在良渚文化中也均有出土，这难道说是偶然的巧合吗？为什么“六瑞”同时出土？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说得很清楚：“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锐，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严，半璧曰璜，地上无物，唯天半见。”吴大澂《古玉图考》也说：“《五代会要》三引崔灵恩《三礼义宗》云，‘苍璧所以礼天，其长尺有二寸，盖法天之十二时’。”又曰：“《白虎通》、《瑞贽》引《礼》云，‘圆中牙，外曰

<sup>①</sup> 杨晶：《中国史前玉器概述》，《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

<sup>②</sup>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sup>③</sup> 朱谦之：《周礼的主要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2日。

<sup>④</sup> 刘大同：《古玉辨》，中国书局，1989年。